

# 呼伦贝尔鲜卑遗存中的西来文化因素

——兼谈两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

潘玲 谭文好

【关键词】呼伦贝尔；鲜卑；南西伯利亚；匈奴；“草原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潘玲、谭文好，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 710127）。

【原文出处】《考古》（京），2022.5.110~120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早期鲜卑遗存研究”（项目编号16JJD78000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呼伦贝尔地区南部及与其毗邻的俄罗斯赤塔地区位于欧亚草原东缘，是最早的鲜卑遗存分布区（以下简称呼伦贝尔地区）。这里的鲜卑遗存虽然与匈奴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但是在陶器、动物纹牌饰、墓葬形制等方面有明显的自身特征。呼伦贝尔南部的鲜卑遗存最早可到西汉早期，但是数量非常少，目前只发现一座墓葬<sup>[1]</sup>。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是该地鲜卑遗存的繁荣时期，东汉后期因鲜卑的南迁导致这里的遗存数量和种类明显减少，魏晋十六国时期数量进一步减少并最后消失<sup>[2]</sup>。

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地区、阿尔泰地区位于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地区，这里的青铜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完整，是欧亚草原东部重要的文化中心。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匈奴文化对南西伯利亚地区曾经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当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形成与匈奴文化共存和融合的态势<sup>[3]</sup>。南西伯利亚地区与呼伦贝尔地区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是没有高山阻隔。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呼伦贝尔地区的早期鲜卑遗存中，包含多种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地区乃至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关注。

## 一、四类外来文化因素

呼伦贝尔及毗邻地区的早期鲜卑遗存，包含四类来自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因素，分别为夹金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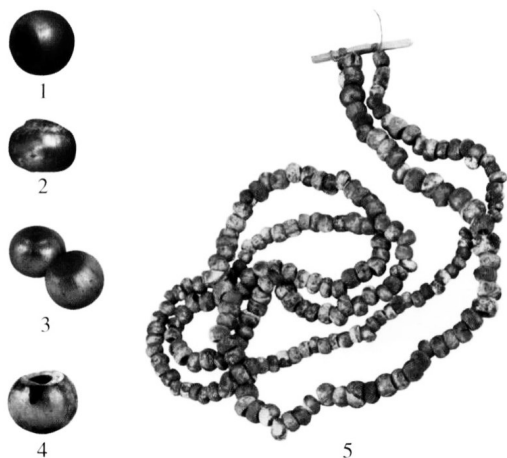
的玻璃珠、腹部近倒三角形的高圈足铜鍍、鍍形陶罐，以及由装饰飞马纹、奔马纹的牌饰和回首鹿纹带饰组成的铜腰带具。

### （一）夹金箔的玻璃珠

蘑菇山墓地共发掘12座墓葬，其中M1、M8、M9共随葬19枚夹金箔的玻璃珠（图一，1），三座墓葬的年代分别为西汉时期、西汉早中期、王莽至东汉前期<sup>[4]</sup>。扎赉诺尔墓地1982年发掘墓葬也出土1枚夹金箔玻璃珠（图一，2），墓葬年代不详，该墓地主体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sup>[5]</sup>。这些玻璃珠均为扁球形或近圆柱形，在两层透明的玻璃中间夹金箔，通过反光看起来整个珠子都是金色。

夹金箔的玻璃珠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已经出现，最早的产地应在地中海沿岸<sup>[6]</sup>。中国境内发现的夹金箔玻璃珠数量特别少，除了呼伦贝尔鲜卑墓葬之外，其余年代最早的见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东汉时期墓葬<sup>[7]</sup>。学界认为呼伦贝尔鲜卑墓葬的夹金箔玻璃珠是从西方传入的，从工艺上分析很可能是来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沿岸<sup>[8]</sup>。蒙古国西部库苏古尔省的努赫金阿姆墓地M3<sup>[9]</sup>、科布多省的索姆布尊波尔齐尔墓地等两处匈奴墓葬遗存也发现数量较少的夹金箔玻璃珠<sup>[10]</sup>（下页图一，3、4）。但是发现夹金箔玻璃珠最多的是米努辛斯克盆地，在该地的扎纳门卡村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墓葬中发现

近200枚夹金箔玻璃珠<sup>[11]</sup>(图一,5)。出土夹金箔玻璃珠的匈奴墓葬分布在蒙古西部,其中科布多省的索姆布尊波尔齐尔墓地发现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流行的宽平缘四乳四虺纹铜镜<sup>[12]</sup>;库苏古尔省的努赫金阿姆墓地虽然没有汉式器物断代,但是墓地所在地区距离米努辛斯克盆地较近。从玻璃珠的数量、年代、分布地域几个方面综合分析,可以看出随葬夹金箔玻璃珠的匈奴墓葬均位于蒙古西部,玻璃珠数量非常少,年代也不早,所以从这里传入鲜卑墓葬的可能性非常小。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夹金箔玻璃珠不仅数量多,而且遗存的年代上限早,呼伦贝尔南部鲜卑遗存的夹金箔玻璃珠从这里传入的可能性最大。



图一 夹金箔玻璃珠

1.蘑菇山墓地M1出土 2.扎赉诺尔墓地1982年发掘墓葬出土 3.蒙古国库苏古尔省努赫金阿姆墓地M3出土 4.蒙古国科布多省索姆布尊波尔齐尔墓地出土 5.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扎纳门卡村墓葬出土(1.引自注释[4]b,2.引自注释[5]a,3.引自注释[9],4.引自注释[10],5.引自注释[11])

### (二)腹部近倒三角形的高圈足铜鍱

扎赉诺尔墓地M3014随葬1件腹部近倒三角形、圈底较尖、圈足细高的高圈足铜鍱<sup>[13]</sup>(图二,1),上

腹部装饰一周夹在两条凸弦纹之间的波浪纹。同样腹部形制和横向布局纹饰的铜鍱目前在中国境内只发现这一件。两汉时期中国境内流行的高圈足鍱的器身近卵形或圆形,东汉中晚期又出现了器身筒形的,流行纹饰是四分的弧线纹<sup>[14]</sup>。尖圈底、细高圈足的铜鍱在相当于战国时期流行于中亚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数量最多,其上腹部常装饰横向的纹饰带<sup>[15]</sup>(图二,2)。进入两汉时期,这类铜鍱在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地区仍然流行,其中阿尔泰地区相当于西汉中期的雅罗曼2号墓地M51随葬的铜鍱<sup>[16]</sup>(图二,3),形制与扎赉诺尔M3014:6非常相似。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相当于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中晚期的伊沃尔加匈奴墓地M119出土1件高圈足铜鍱(图二,4),器身较扎赉诺尔M3014:6略深,口内收程度略大,但是腹部有两条横向弦纹的纹饰布局与后者相似<sup>[17]</sup>。蒙古境内杜尔利格纳尔斯匈奴墓地M4虽然也发现1件近倒三角形器身的铜鍱,但是腹部更深,器表饰四分弧线纹<sup>[18]</sup>(图二,5),与扎赉诺尔M3014:6差别较大。

相比较而言,扎赉诺尔M3014出土铜鍱大口、浅腹的特征与南西伯利亚一带的铜鍱最相似。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墓地M119的铜鍱虽然与扎赉诺尔M3014所出者也有较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形制的高圈足铜鍱在外贝加尔地区仅此一件。所以,扎赉诺尔墓地M3014的高圈足鍱来自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可能性最大。

### (三)鍱形陶罐

除了上述高圈足铜鍱,在呼伦贝尔地区的蘑菇山墓地M1、扎赉诺尔墓地、孟根楚鲁鲜卑墓葬、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南沙带等地都发现带高圈足的



图二 铜鍱对比图

1.扎赉诺尔墓地M3014:6(器耳根据照片绘制) 2.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查多别茨村采集(公元前5~4世纪) 3.俄罗斯阿尔泰地区雅罗曼2号墓地M51出土 4.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墓地M119出土 5.蒙古国肯特省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M4出土(1.引自注释[13],2.引自注释[15]b,3.引自注释[16],4.引自注释[17],5.引自注释[18])

鍍形陶罐<sup>[19]</sup>(图三,1~4),有的下腹内收成尖圜底。孟根楚鲁所出鍍形罐的器表有仿自铜鍍的四分弧线纹。蘑菇山M1的年代为西汉时期,扎赉诺尔墓地主体年代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孟根楚鲁鲜卑墓葬所出鍍形陶罐圈足以上器身的形制与该墓地M2、M3、M7所出的大口深腹罐的形制非常相似,这三座墓葬的年代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西乌珠尔苏木南沙带采集的鍍形陶罐的器身与当地鲜卑遗存常见的大口深腹罐相似,肩部有一周带锯齿的附加堆纹。肩部带锯齿状附加堆纹的大口深腹陶罐,是呼伦贝尔地区魏晋时期鲜卑遗存流行的形制<sup>[20]</sup>。可见,鍍形陶罐在呼伦贝尔地区存在时间较长,从西汉时期一直流行到魏晋时期。

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鍍形陶罐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在捷西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和塔施提克文化(公元1~5世纪)的遗存中都非常流行,有的还模仿出鍍的立耳和器身上的纹饰<sup>[21]</sup>(图三,6、7)。图瓦地区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遗存也常见鍍形陶罐,如艾尔米雷格墓地XXXI墓群随葬的鍍形陶罐(图三,8)和普通陶罐都流行装饰仿铜鍍器表的纹饰。艾尔米雷格墓地XXXI墓群共发掘200余座墓,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认为它们的年代

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是当地文化与匈奴文化融合的遗存<sup>[22]</sup>。但是,这些墓葬的腰带具大多数为铁质,不见西汉早中期匈奴文化流行的饰镂空纹饰的青铜带具,而铁质腰带具在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才成为匈奴腰带的主体<sup>[23]</sup>。艾尔米雷格墓地XXXI墓群还出土宽平缘上装饰锯齿纹的博局纹铜镜残片,这种铜镜流行于新莽至东汉早期<sup>[24]</sup>。所以,根据出土遗物判断,艾尔米雷格墓地XXXI墓群的墓葬年代应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至公元1世纪,俄罗斯学者的断代偏早。

蒙古和外贝加尔的匈奴墓葬目前只发现2件鍍形陶罐,其中伊沃尔加墓地的鍍形陶罐<sup>[25]</sup>(图三,9)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同类器形制相似,蒙古中东部布尔干省的布尔干陶勒盖墓地M38随葬的鍍形陶罐<sup>[26]</sup>(图三,10)与呼伦贝尔地区的同类器形制相似。匈奴墓葬发现的鍍形陶罐数量少且分布分散,不具备对呼伦贝尔地区产生影响的条件。

米努辛斯克盆地及与其邻近的图瓦地区、呼伦贝尔地区是鍍形陶罐发现最多的两个区域,米努辛斯克和图瓦的鍍形陶罐形制多样且形状更接近实用的高圈足铜鍍,整体年代也早于呼伦贝尔地区。因此,呼伦贝尔及附近地区鲜卑遗存中的鍍形陶罐,应该是



图三 鍍形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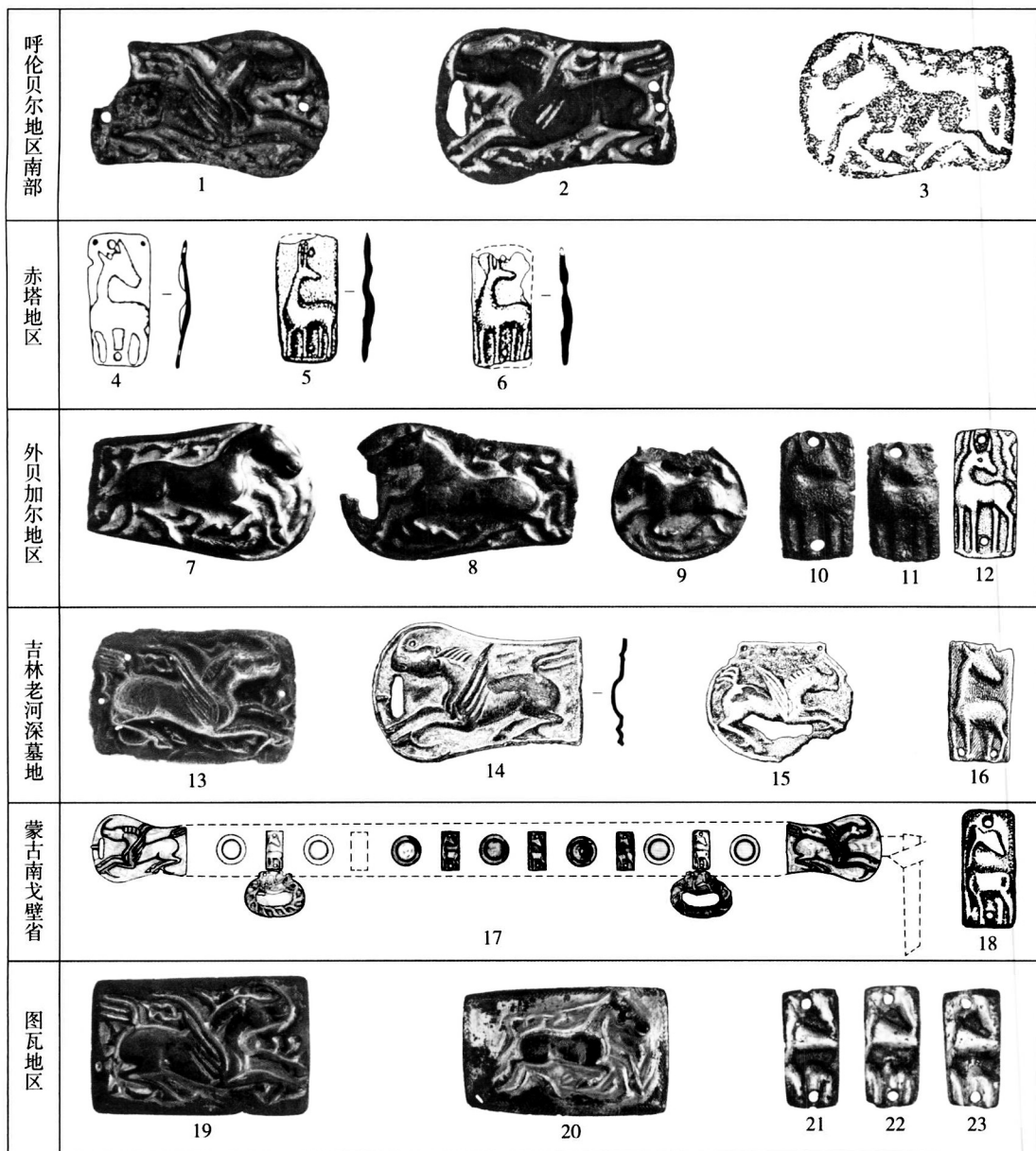
1.蘑菇山墓地M1出土 2.扎赉诺尔墓地1960年发掘墓葬出土 3.孟根楚鲁鲜卑墓葬出土 4.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南沙带采集 5.商都县东大井墓地M17出土 6.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切尔涅奥泽罗1号墓地1号冢出土 7.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乌斯金肯墓地捷西期墓葬出土 8.俄罗斯图瓦地区艾尔米雷格墓地XXXI墓群出土 9.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墓地M139出土 10.蒙古国布尔干省布尔干陶勒盖墓地M38出土(1、2.引自注释[19]a,3.引自注释[19]b,4.引自注释[19]c,5.引自注释[42]a,6、7.引自注释[21]a,8.引自注释[21]b,9.引自注释[25],10.引自注释[26])

受到了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地区的影响而出现。

(四) 飞马纹、奔马纹牌饰和回首鹿纹带饰

扎赉诺尔墓地 1959 年发掘墓葬中出 1 对带双翼的飞马纹铜牌饰<sup>[27]</sup>(图四, 1、2) 和 1 件写实的奔马纹铜牌饰<sup>[28]</sup>(图四, 3), 两者均为椭圆形, 纹饰为浮雕状。这一时期的飞马纹腰带牌饰目前共发现 9 件, 除了扎

赉诺尔的 2 件, 吉林省榆树市老河深墓地 M56 和 M105 各出 1 对<sup>[29]</sup>(图四, 13、14), 蒙古南戈壁省征集一套有 1 对飞马纹牌饰的腰带具<sup>[30]</sup>(图四, 17), 俄罗斯图瓦地区的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M154 出土 1 件<sup>[31]</sup>(图四, 19)。榆树老河深 M105 所出腰带具中的 2 件带环也装饰飞马纹(图四, 15)。写实的奔马纹牌饰



图四 飞马纹牌饰、奔马纹牌饰、鹿纹带饰

1~3. 扎赉诺尔墓地 1959 年清理墓葬出土 4. 俄罗斯赤塔地区左尔郭勒 1 号墓地 M20 出土 5、6. 俄罗斯赤塔地区基雅 13 号墓地出土 7~12. 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恩赫尔墓地 M52 出土 13、16. 老河深中层墓葬 M56 出土 14、15. 老河深中层墓葬 M105 出土 17、18. 蒙古南戈壁省征集 19. 俄罗斯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M154 出土 20. 俄罗斯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M57 出土 21~23. 俄罗斯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M65 和 M156 出土 (1~3、7、8、13、14、19、20. 牌饰 4~6、10~12、16、18、21~23. 带饰 9、15. 带环 17. 腰带复原示意图; 材质均为铜鍍金; 1、2. 引自注释[27], 3. 引自注释[28], 4. 引自注释[35], 5、6. 引自注释[36], 7~12. 引自注释[32], 13~16. 引自注释[29], 17、18. 引自注释[30], 19. 引自注释[31], 20. 引自注释[33], 21~23. 引自注释[34])

目前只发现4件,除了扎来诺尔墓地,还在外贝加尔的恩赫尔墓地 M52 出土 1 对,为同一条腰带上的带具(图四,7、8),该墓还出土 1 件带奔马纹的椭圆形牌状带环<sup>[32]</sup>(图四,9);在图瓦地区的艾尔米雷格墓地 M57 出土 1 件近长方形奔马纹牌饰<sup>[33]</sup>(图四,20)。

外贝加尔恩赫尔墓地 M52、榆树老河深 M56 和 M105、蒙古南戈壁省、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的 M65 和 M156<sup>[34]</sup>均出土浅浮雕回首鹿纹的长方形带饰(图四,10~12、16、18、21~23)。根据南戈壁省(见图四,17)和老河深墓地的三套腰带具组合情况可知,每条腰带上装饰三至六个回首鹿纹带饰,与另一种形状的带饰相间分布,或者鹿纹带饰呈一定间隔分布。中国呼伦贝尔地区南部的鲜卑墓葬虽然目前没有发现此类鹿纹带饰,但是在与其毗邻的俄罗斯赤塔地区左尔郭勒 1 号墓地 M20<sup>[35]</sup>,以及基雅 13 号墓地<sup>[36]</sup>,都发现了同样形状的回首鹿纹带饰(图四,4~6)。左尔郭勒 1 号墓地与呼伦贝尔南部的鲜卑遗存文化性质相同,基雅 13 号墓地年代与左尔郭勒 1 号墓地接近<sup>[37]</sup>(表一)。

以上三种腰带具,除了蒙古南戈壁省的腰带为征集品,其他的均为发掘出土。其中老河深 M56 随葬新莽至东汉早期流行的七乳鸟兽纹铜镜,前文已经论证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的年代应在公元前 1 世纪晚期至公元 1 世纪。左尔郭勒 1 号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出三种腰带具的墓葬或者无可断代的器物,或者未发表墓葬编号,但是通过器物对比可知,

两墓地的年代范围分别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后期、西汉中晚期至曹魏时期,主体年代均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sup>[38]</sup>。根据以上墓地或墓葬的年代,可知飞马纹和奔马纹牌饰、回首鹿纹带饰流行年代应为公元前 1 世纪晚期至公元 1 世纪末,相当于中原的新莽至东汉早期的可能性最大。

北方式金属腰带具中的动物纹铜牌饰,西汉时期流行长方形,东汉时期流行椭圆形,并且牌饰后半部两侧缘略内凹<sup>[39]</sup>。根据牌饰轮廓形状的时代特征,可将上述 13 件飞马纹和奔马纹牌饰分为两个阶段,较早的是长方形的,包括图瓦艾尔米雷格 XXXI 墓群 M57 的奔马纹牌饰和 M154 的飞马纹牌饰、老河深 M56 的飞马纹牌饰,根据老河深 M56 随葬铜镜可知,它们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 1 世纪末至公元 1 世纪早期,即西汉末至东汉早期。略晚的是椭圆形轮廓的 9 件,包括老河深 M105 的 1 对飞马纹牌饰、扎赉诺尔的 1 对飞马纹牌饰和 1 件奔马纹牌饰、蒙古南戈壁省的 1 对飞马纹牌饰、外贝加尔恩赫尔墓地 M52 的 1 对奔马纹牌饰,牌饰的后半部两侧缘均略内凹,年代应相对略晚于较早阶段者。

图瓦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出土的飞马纹和奔马纹牌饰均呈长方形,在所有地点中年代最早。

老河深中层墓地是夫余的遗存<sup>[40]</sup>,夫余是农业民族,不流行腰带具,老河深中层发现的两套腰带具,是目前汉代夫余遗存仅见的两例,它们应该不是夫余自产的,而是从外地输入的舶来品。飞马纹牌

表一 飞马纹牌饰、奔马纹牌饰、鹿纹带饰统计表

区域	出土地点	飞马纹牌饰	奔马纹牌饰	回首鹿纹带饰
图瓦地区	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M57		■ 1	
	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M154	■ 1		
	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M156			√
	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M65			√
外贝加尔地区	恩赫尔墓地 M52		● 2	4
呼伦贝尔及毗邻地区	扎来诺尔墓地	● 2	● 1	
	左尔郭勒 1 号墓地 M20			√
	基雅 13 号墓地			√
吉林省	榆树老河深墓地 M56	■ 2		5
	榆树老河深墓地 M105	● 2		3
蒙古国	蒙古南戈壁省	● 2		√

说明:数字表示腰带具的数量,√表示出土相应种类的腰带具;■表示为长方形牌饰,●表示为椭圆形牌饰。

饰、奔马纹牌饰、回首鹿纹带饰等三种腰带具俱全的,只有图瓦地区和呼伦贝尔地区两地,其他地区的都只有两种(见表一)。所以,从年代和种类两方面分析,呼伦贝尔地区的飞马纹、奔马纹牌饰和回首鹿纹带饰,只可能来源于图瓦地区,因为只有后者相对年代最早且种类最全。

## 二、文化因素传播的时间和方向

以上四类器物都有在同一墓地或同一墓葬共存的铜镜作为断代依据。目前共发现5面此类共存铜镜,有三种纹饰,其中3面为宽平缘上带锯齿纹的博局纹铜镜残片(1面可进一步确认为禽兽博局纹镜),1面为宽平缘上带锯齿纹的七乳鸟兽纹镜,1面为宽平缘的四乳四虺纹镜(表二)。三类铜镜的流行时间集中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可延续至东汉中期。根据共存铜镜的流行年代,可将四类文化因素传播的主要时段,确定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出夹金箔玻璃珠的蘑菇山 M8 年代为西汉早中期,扎赉诺尔 M3014 的铜镜年代在西汉中期左右。孟根楚鲁和西乌珠尔苏木南沙带的鍍形陶罐圈足以上的器身与当地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大口深腹罐形制特征相同,但是与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同时期的鍍形陶罐形制差别较大,这说明呼伦贝尔地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鍍形陶罐是在当地鍍形罐基础上吸收了本地陶器形制特征后,形成的富有地域特征的新器形,不再是与鍍形陶罐来源地之间保持交流的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可将呼伦贝尔地区鲜卑遗存与图瓦、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南西伯利亚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时间范围确定在西汉早中期至东汉中期,主要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除了两种马纹牌饰和鹿纹带饰在图瓦和呼伦贝尔及毗邻地区发现的数量相当以外,其余三类器物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数量均明显多于呼伦贝尔地区。鍍形陶罐、腹部近倒三角形的高圈足铜鍍都在米努辛斯克和图瓦地区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演变,流行年代也整体上早于呼伦贝尔地区的同类器物,并且在南西伯利亚地区不见来自呼伦贝尔及附近地区的文化因素。由此可以肯定,以上四类器物可能是单方向的由西向东传播,而不是两地之间双向的文化交流,呼伦贝尔地区可能主要是单纯地接受文化影响的一方。

在汉代匈奴统治区域的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上述四类器物发现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少于南西伯利亚和呼伦贝尔地区,它们在蒙古境内的分布地点比较分散,在外贝加尔地区相对集中,而后者正处于南西伯利亚与呼伦贝尔之间连线的中间地带。这一情况说明从南西伯利亚向呼伦贝尔地区的文化传播,应该是两地之间的直接传播,虽然在属于匈奴偏北区域的贝加尔湖东岸有少量发现,但只是沿途的个别流布。

## 三、西来文化因素对鲜卑文化的影响

鲜卑遗存中来自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器物,结局不尽相同。夹金箔玻璃珠、腹部近倒三角形的高圈足铜鍍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现数量很少,也很快消失,没有进一步发展。

鍍形陶罐在呼伦贝尔地区从两汉之际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随着鲜卑南下长城地带,鍍形陶罐也在东汉晚期出现于内蒙古中部的鲜卑墓地,如在年代相当于东汉晚期的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sup>[41]</sup>、年代可晚到西晋时期的商都东大井墓地<sup>[42]</sup>都出现了鍍形陶罐(图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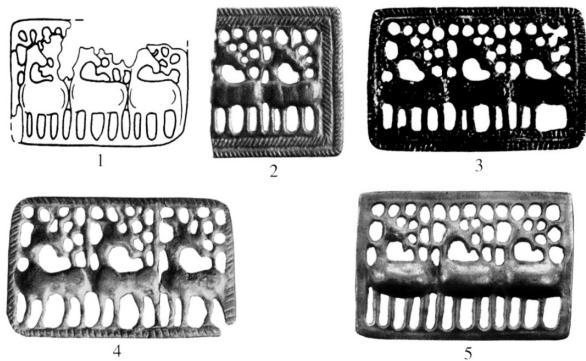
飞马纹和奔马纹牌饰在东汉前期以后很快消

表二 四类器物与铜镜共存情况统计表

出土地点	器物名称	共存铜镜种类	铜镜流行年代
俄罗斯图瓦地区艾尔米雷格墓地 XXXI 墓群	飞马纹牌饰、奔马纹牌饰、鹿纹带饰	带锯齿纹宽平缘的博局纹铜镜	新莽至东汉早期,可延续至东汉中期
蒙古国科布多省索姆布尊波尔齐尔墓地	夹金箔玻璃珠	宽平缘的四乳四虺纹铜镜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呼伦贝尔地区扎赉诺尔墓地	夹金箔玻璃珠、腹部近倒三角形的高圈足铜鍍、鍍形陶罐、飞马纹牌饰、奔马纹牌饰	带锯齿纹宽平缘的禽兽博局纹铜镜	流行于新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以后少见
俄罗斯赤塔地区左尔郭勒 1 号墓地	腹部近倒三角形的高圈足铜鍍、鍍形陶罐、鹿纹带饰	带锯齿纹宽平缘的博局纹铜镜	新莽至东汉早期,可延续至东汉中期
吉林省榆树老河深墓地中层墓葬 M56	飞马纹牌饰、鹿纹带饰	带锯齿纹宽平缘的七乳鸟兽纹铜镜	新莽至东汉早期,可延续至东汉中期

失。回首鹿纹带饰虽然没有在鲜卑遗存中进一步发展,但却由之演化出鲜卑文化的一种代表性器物——三鹿纹牌饰。

鲜卑的矩形三鹿纹牌饰和匈奴动物纹牌饰均为镂空<sup>[43]</sup>(图五),但由三个形制相同的动物并排站立的构图以及鹿纹题材都不见于匈奴的动物纹铜牌饰来看,它也不可能直接来源于匈奴。



图五 三鹿纹牌饰

1. 扎赉诺尔墓地 1986 年发掘墓葬 M3002; 2. 扎赉诺尔墓地 1984 年发掘墓葬 M5 出土 3. 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地出土 4.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伊和海尔罕苏木和日木图嘎查出土 5.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井滩村出土(1、4. 材质为铜鎏金, 2、5. 材质为金质, 3. 材质为铜质; 引自注释[43])

三鹿纹牌饰上的回首伫立状鹿形象,与回首鹿纹带饰上鹿的形象基本相同,只不过造型进一步简化。回首鹿纹带饰是和其他带饰相间分布,重复出现在腰带的带身上(见图四,17)。三鹿纹牌饰是将重复出现在腰带上的三个回首鹿纹带饰的图案组合在一个牌饰上,将回首鹿纹带饰的浅浮雕状纹饰改为镂空装饰。观察保存状况较好、年代略早的三鹿纹牌饰照片,还能看出在两只鹿纹之间的鹿尾部至牌饰上缘处有纵向隔栏的痕迹,隔栏较直且略凸出,与附近其他镂空边缘形状有明显区别(图五,2~5)。这是三鹿纹牌饰上保留下来的三个单独的长方形回首鹿纹带饰组合在一起的痕迹,其中锡林郭勒盟和日木图的三鹿纹牌饰上这一痕迹最清楚(见图五,4)。

#### 四、两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

南西伯利亚向呼伦贝尔一带的文化传播早在西汉早中期已经出现,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时段。这一时间范围与匈奴政权存在的年代基本重合(秦汉之际至东汉中期)。匈奴周边一直存在未被其彻底征服的族群。根据文献记载可知,

虽然匈奴以北的丁零、鬲昆、薪犁等在西汉初年被匈奴征服<sup>[44]</sup>,但是它们没有全部灭亡,因为一百余年后的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 72 年),丁令还是受制于匈奴的“诸羈縻国”之一,并乘匈奴遭受雪灾入境侵扰<sup>[45]</sup>。之后二十年(宣帝甘露年间),匈奴郅支单于向西和北面降服坚昆、乌揭、丁令,将都城迁到坚昆境内<sup>[46]</sup>。在北匈奴灭亡前夕的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匈奴北面的丁令(丁零)又与匈奴周边族群联合,乘机攻打北匈奴<sup>[47]</sup>。但是除了汉代以后成书的文献追忆鲜卑的祖先东胡在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灭以外<sup>[48]</sup>,在匈奴政权存在的近二百年时间里,文献不见任何鲜卑被匈奴打击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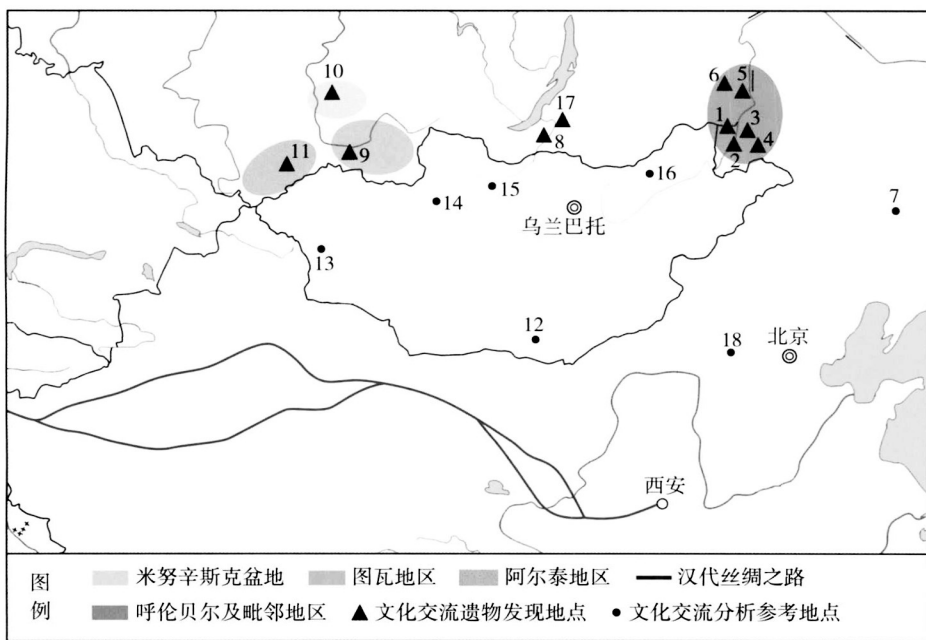
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地区和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阿尔泰山地区位于匈奴北面偏西处,这里向呼伦贝尔地区的文化传播,最有可能是丁零或坚昆等族群受到匈奴的打击,少数人群向相对安全的鲜卑居住区东迁的结果。

这一文化传播路线有意回避了匈奴的中心区域——今蒙古境内,与西汉中期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有异曲同工之处。张骞开辟的汉代丝绸之路,在新疆段绕开了西汉以前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地区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北疆地区<sup>[49]</sup>,向南转入天山以南的南疆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带,之后穿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以避开长期被匈奴势力控制的北疆。这两条文化交流路线一南一北,分布于匈奴中心区域的南、北两侧,大致呈东西向平行分布,分别是中原与中亚绿洲和草原地区、欧亚大陆东部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路线(图六)。

如果将华夏文明及其影响区域与其他文化传统分布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通道泛称为丝绸之路,那么或可将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南西伯利亚地区与呼伦贝尔及毗邻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路线,称为两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它对鲜卑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的余波随鲜卑的南迁到达北方长城地带,最后融入中原文化。

#### 参考文献:

[1]潘玲、谭文好:《蘑菇山鲜卑墓地断代研究》,见《北方民族考古》第 12 辑,科学出版社,2021 年。



图六 南西伯利亚与呼伦贝尔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示意图

1. 蘑菇山墓地 2. 扎赉诺尔墓地 3. 孟根楚鲁墓地 4. 西乌珠尔苏木南沙带 5. 左尔郭勒1号墓地 6. 基雅13号墓地 7. 老河深墓地 8. 恩赫尔墓地 9. 艾尔米雷格墓地 10. 扎纳门卡村 11. 雅罗曼2号墓地 12. 南戈壁省 13. 索姆布尊波尔齐尔墓地 14. 努赫金阿姆墓地 15. 布尔干陶勒盖墓地 16. 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 17. 伊沃尔加墓地 18. 东大井墓地(本图底本引自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亚洲地区,并做裁剪、简化,审图号:GS(2016)2938号)

[2]a. 同[1].

b.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3]a. Савинов Д. Г., *Минуси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Хунну*, СПб, 2009.

b. МандельшГам А. М., *Ранние кочевники скифского лериод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увы, 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С. 178-196, М., 1992.

[4]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等:《满洲里市蘑菇山墓地发掘报告》,《草原文物》2014年第2期.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第158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c. 同[1].

[5]a.《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第132页.

b. 同[2].

[6]安家瑶:《夹金箔层的玻璃珠》,见《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7]史美光、周福征:《青海大通县出土汉代玻璃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0年第2期.

[8]崔剑锋:《见微知著:从扎赉诺尔蘑菇山墓地出土古罗马玻璃珠看汉晋时期的草原丝路》,见《北京论坛(201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变化中的价值与秩序:文明传承与互动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论文与摘要集》,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办公

室,2017年.

[9]Eregzen G.,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fig. 145, p. 122. Ulaanbaata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2011.

[10]*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fig. 146, p. 122.

[11]Пиотровский М. Б., *Мир кочевников. Из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оллекций Госу д 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С. 87, Кат. 279, СПб, 2013.

[12]*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fig. 196, p. 148.

[1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4]潘玲:《中国北方晚期鍍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

[15]a. 冯恩学:《中国境内的北方系东区青铜釜研究》,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b. *Мир кочевников. Из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оллекций Госу-г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С. 27, Кар. 52.

[16]Tishkin Alexei A., *Characteristic Burials of the Xiongnu Period at Ialoman-II in the Altai, Xiongnu Archaeology: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fig. 9, 7, pp. 539-558, Bonn: Press unibonn, 2011.

[17]Давыдова А. В., *Иволгин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Том 2, *Иволгин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СПб, 1996. 根据出土与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相同匈奴风格器物的西岔沟墓地的断



代可知,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年代上限应为西汉早期晚段。参见辽宁省博物馆等:《西丰西岔沟》,文物出版社,2022年。

[18]ШУА-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урээлэн, Монголын Үндэсний Музей, Солонгосын Үндэсний Музей, *Дуурлиг Нарсны Хунну Булиц*, p. 32,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9.

[19]a.《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第94、159页。该书第94页的鍍形陶罐(本文图三,2)照片说明标注为扎赉诺尔墓地1962年发现器物,但是这件器物的线图见于扎赉诺尔墓地1960年发掘的简报(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这说明《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的照片说明文字有误,可能是将器物入藏博物馆时间误认为发掘时间。

b. 孟根楚鲁鲜卑墓葬出土的鍍形陶罐照片为本文作者在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展厅内拍摄。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陈巴尔虎旗卷》第7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0]同[2]b。孟根楚鲁墓葬、西乌珠尔苏木南沙带两地出土鍍形陶罐的断代也据此文。

[21]a. *Минуси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Хунну*, С. 182, Табл. XVI, 1, С. 224, Табл. LVIII, 5.

b. Пшеницына М. Н., Тесинский эгап, *Степная полог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С. 224-235, Табл. 79, 5, М., 1992.

[22]同[3]b。

[23]潘玲:《两汉时期北方系统腰带的演变》,《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

[24]白云翔:《秦汉铜镜的类型及其演变》,见《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铜镜断代均参照此文。

[25]同[17]。

[26]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fig. 225, p. 160.

[27]《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第124~127页。

[28]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

[2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第63~67页,彩版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30]Erdenechuluun P., Erdenebaatar D., *The Sword of Heaven—Culture of Bronze Artifacts of the Bronze Age and Hunnu Empire*, fig. 381, pp. 388-389, Ulaanbaatar, 2011.

[31] *Мир кочевников. Из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оллекц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С. 84, Кат. 258.

[32]Коновалов П. Б., Базаров Б. А., Именохоев Н. В., Миягашев Д. А., Поясная фурнитура из Енхорского хуннского могильника, *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древн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2018, Том 14, No 04, С.64-77.

[33] *Мир кочевников. Из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оллекц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С. 84, Кат. 253.

[34] *Мир кочевников. Из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оллекц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С. 84, Кат. 255.

[35]Яремчук О. А., *Моник Зоргол-1—памятник хунно-сяньбийской эпохи Степной Даурии*, С. 293, Рис. 117, 37,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Чита, 2005.

[36]Ковычев Е. В.,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этническ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 в конце I тыс. до н. э.—I тыс. н. э., Рис. 3, 18, 19, *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древн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Вып. 4, С. 242-258, Иркутск, 2006.

[37]关于左尔郭勒1号墓地为鲜卑遗存的认识,参见注释[2]。基雅13号墓地发表材料较少,俄罗斯学者认为是匈奴文化遗存但是没有进一步论证。从发表材料看,该墓地金属器物以铁质为主,铜器所占比例较小,根据带具和铁镞形制判断其年代应与左尔郭勒1号墓地接近,大致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38]同[2]。

[39]同[23]。

[40]林沅:《西岔沟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见《林沅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1]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42]a. 李兴盛、魏坚:《商都县东大井墓地》,见《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b. 东大井墓地断代参见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43]图五的三鹿纹牌饰资料来源如下。

a. 同[13]。

b.《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第144页。

c. 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见《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d. 珊丹、魏坚:《正蓝旗和木图鲜卑遗存》,见《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e. 马自树:《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物集粹》第15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44]《史记·匈奴列传》第28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45]《汉书·匈奴传》第3787页,中华书局,1962年。

[46]《汉书·匈奴传》第3800页,中华书局,1962年。

[47]《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第2950页,中华书局,1965年。史学界普遍认为,《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和《史记》中的“丁零”,与《汉书》中的“丁令”含义相同,“令”为“零”的同音异体字。

[48]《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2985页,中华书局,1965年。

[49]林沅:《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